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王杰

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讲的是要相互讲信守义、建立和睦关系；“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讲的是要亲近仁道、友善邻国，这是治理国家的方略。中华文明是推崇信义、和睦、仁道、友善的伟大文明。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之间讲信守义、和睦相处、仁爱相助、友善邻国，是中华民族基于明德追求与大同理想而形成的处世之道、交往之道。丝绸之路就是这种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结出的硕果。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中国与亚欧大陆上的先人们不畏艰险，探索开辟出多条连接亚欧非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道。南北朝时期沈约在《宋书》中讲“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贾、使者来往频繁的热闹场面与繁荣景象。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世代相承、薪火相传。今天，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加强互联互通、共谋繁荣发展，赋予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交往之道新的时代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重要元素，也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都对中华文明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的拘囿，形成开放包容、平和中正的文明特质作出了贡献。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一种“和”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精神理想平和而坚毅，胸襟宽广而开阔，有着深切关注人类命运的天下情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倡导慎战不战。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却从未殖民和侵略他国。《左传》中讲“止戈为武”，意思是说息兵戈才是武功，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武功。“武”的真谛是消除战争、安定百姓。《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张慎战不战。同为早期兵法著作的《司马法》第一篇是《仁本》，核心思想是战争要贯彻以仁为本原则，“国虽大，好战必亡”就出自于此。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信奉丛林法则，以强欺弱、穷兵黩武，必将走向灭亡。几千年来，和平性已经深深烙在中华文明的特质里，刻进中华儿女的基因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倡导相互协调。从和平、和睦到和谐、和合，中国人对“和”的探究，不止体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还深入到自然法则、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理解“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要追求通过协调发展而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和完美秩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在于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关键在于做到彼此尊重；实现人自身的和谐，就要做到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通过实践和自省提升自己的品格和道德。

倡导共生并进。中国人所讲的“和”并不是完全相同、毫无变化的，并不追求单一、静止、无差别的和谐，而是在尊重事物多样性和差别性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达成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孟子·滕文公上》讲：“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告诫人们不能简单粗暴对待事物的差异，不能强制消除差别。《论语·子路》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内在的和谐与友善，而不是表面上的相同与一致，这正是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共生共存的基本法则。可见，“和”的精神是一种对他者的承认、对差别的尊重、对异己的包容，以达到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倡导交通成和。《周易》中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意思是说天地阴阳交合，方有万物的生养畅通；社会上下交流沟通，方可志同道合。《庄子·田子方》中讲：“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中国古人认为，开放交流才能发展进步、充满活力，才能达致“和”的状态。《礼记·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周易》中讲：“君子以朋友讲习”，意在提倡朋友之间互相讲习交流、互相学习借鉴、互相受益进步。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始终秉持和平包容的态度，而不是排斥、对抗、征服，并通过积极的对话交流汲取不同文明所长，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这种“和”的智慧让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发展、不断壮大。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奠定坚实历史
根基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历史根基、提供了充沛文化滋养。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理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积极参与

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回顾世界历史，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掠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不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老路，不照搬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不靠殖民掠夺，不转嫁矛盾，通过独立自主、艰苦奋斗，通过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掀开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崭新一页，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天下大同、共生并进、交通成和的理念，今日中国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将这些理念发扬光大。中国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有力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能力、共建国家发展水平与国际合作新范式的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发展注入了更多强劲动能。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全球秩序的维护者。“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能够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坚持团结合作，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求和平、谋发展，凝结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智慧。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给予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底气和丰富智慧。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丰富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更多中国方案，使之在人类应对风险挑战、开辟光明未来的道路上彰显更大的价值、更强的力量。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对于全面认识中华文明历史弥新、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对于今天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期学术版围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进行阐述。

——编者

学术随笔

XUE SHU SUI BI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深知和平之宝贵。和谐稳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活方式，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处世之道，和合仁善是中华文明几千来的文化基因。在长期发展中，中华文明形成了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平正义的战争观，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处。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化育万物、诞生人类，天地人互相联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普遍联系和整体思维，将自然之道和人间伦理有机联系起来。宇宙万物、人类社会既千差万别又是一个统一整体，和合相生、生生不息。这一宇宙观蕴含着顺应自然、敬畏自然、敬畏秩序的文化基因。和谐、稳定、秩序是中华先民史前时期就形成的生活方式，并一直延续下来。比如，考古发现表明，八千年前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村落里房屋成排分布，六千多年前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姜寨等村落里房门朝向中央广场，都显示出社会内部崇尚集体利益、社会秩序井然。八千年前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等的墓葬排列整齐，已有“族葬”习俗，将现实社会秩序延伸到身后世界。无论是聚落、墓葬的排列有序，还是都邑的中轴对称，礼器的成组成套等，都体现出中国人对秩序和稳定的不懈追求。

中国古代主张天下万邦和谐相处、和合共生，不滥杀无辜、不絶人祭祀，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比如，西周建立后不但封商人后裔于宋，而且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也都各有封地，这与侵略扩张的帝国观有着重要区别。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中国在西传彩陶、黍、粟等的同时，也接纳了西来的绵羊、黄牛、小麦、冶金术等。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铸钱技术等生活用品和民用技术从中国传到西方各地，传播方式是和平交往和商业贸易而非侵略战争。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中华文明的发展，正是不同文明通过相互对话、相互交融获得共同进步的例证。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不同文明各有特色、各有优长。彼此尊重、相互依存、包容互鉴、共同发展，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和平也是中国伦理和思想的重要准则。中国人对和平的追求还体现在社会观和道德观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国地理环境广阔多样，族群文化多姿多彩，但在距今六千年左右就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这是和而不同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五音相和才有旋律，五味调和才成美味。和而不同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秘诀。上善若水，仁者爱人。从善爱自己、家人推及仁爱他人、社会，这是中华民族美好的核心内容。和平与“仁”的价值相结合，通过对他人的关心关爱践行和平性的理念。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在多数时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没有对外扩张和殖民，这是中华民族和善友爱的证明。

当然，战争有时是难以避免的，和平性并不意味着懦弱。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秉承和平正义的战争观。中国人深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文武之道，先文后武，先礼后兵，不挑起战争，也不畏惧战争，战争必出于正义、为了和平。

中华文明何以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厚的农业基础是孕育和平性的重要土壤。可以说，和平是中华文明从源头开始的内在追求。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河流地区，具备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农业生产需要较长周期，种子的选育、土地肥力的维持、生产工具与设施的制备、水利设施的建造维护、生产经验的传承等，都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农耕区，加上“南稻北粟”农业结构体系的互相补充，以及小麦等农作物的传入，粮食来源相对稳定，为稳定定居、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华先民眷恋故土，大多数情况下的迁徙不过是农民对新耕地的开垦，在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

和平使文明成果得以长期保存，和谐使文明得以稳步向前，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发展提供了保障。今天，我们依然走在和平发展的宽广道路上，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和平发展成功的各项原因背后都有中华文明智慧的光芒，都是我们文明基因与现代精神的结合。我们要始终坚守并不断激活和平的文明基因，同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合作，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平等、互鉴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学苑论衡

XUE | YUAN | LUN | HENG

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在中华文明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思想理念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然要求。

诸多元素塑造出中
华文明的和平性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诸多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精神支撑。《周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以宽厚之德对待天下民众和事物。《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论语》中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激发人们弘扬光明正大的德性，自觉“道”弘扬光大。这种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经过中华儿女的践行传承与历史长河的淘洗积淀，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人己关系准则，以道德秩序构造出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理想支撑。《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倡导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引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各有所养、各尽所能，胸怀天下、谋求大同。中国古人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认为“天下”并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天下，而是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天下，表达出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守望相助的愿望和理想。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实践支撑。“讲

历久弥新 绵延不断

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繁荣发展

邢丽菊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几千年连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传统，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传统基因。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和”的文明，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中国传统认为，事物都有可取之处，要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虚心态度来丰富自己。中国古人强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君子以厚德载物”，反映了对他者尊重包容的态度。中国古代政治追求“天下大同”，履行“行天下之大道”的政治法则，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体现了对世界秩序和人类福祉的关切。“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和”要求既肯定和接受事物的多样性，又包容和接纳事物的差异性，并将不同事物融合到一个和合体中，以期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漫长历史沉淀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文明实现交流互鉴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张骞通西域开辟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向西打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大门。玄奘赴天竺取经，推动了印度佛教经典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鉴真东渡日本，将唐朝的先进文化传至东瀛。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中西贸易流通和文化交流。古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范例，不仅中国的儒道思想日益西渐，起源于异域的佛教等宗教文化也传入中国。中华文明在凸显民族特性的同时，以开放心态吸收借鉴域外文明，在相互碰撞和交汇中实现了自我成长与创新。文

化和宗教的交流不仅为沿线贸易的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促进了中外民众人文层面的相互理解和精神层面的深入沟通。可以说，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绵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明交流互鉴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并更新古老中华文明，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既有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视野，也有中华文明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其本身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这一文明观超越西方强权独霸、零和博弈、唯我独尊的观念，展现了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图景。

文明交流互鉴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力量。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沉渣泛起，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阻碍国际社会交流合作。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诉求，引领文明包容共存的前进方向。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增进了解、建立互信、构筑友谊、加强合作的应有之义。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文化血脉，每个国家都有其文明渊源。要理解不同文明的差异，欣赏文明的多彩之美，就要既坚持自身文明传统，又对其他文明持开放包容态度。只有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才能消除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避免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全球文明倡议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以宽广胸襟实现不同文明对话，以团结化解分裂、以合作回应对抗、以包容代替排他，必将为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